

网络圈群栖居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及应对

■ 阎国华 闫 晨

(中国矿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由社群化网络交往而衍生的网络圈群正在成为大学生人际交往、信息获取以及思想交流等活动的主要阵地,并逐渐消耗他们越来越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网络圈群栖居现象是现实交往和网络特性相互作用的结果,是社交媒体时代大学生的生活新业态,为其价值观塑造带来了全新际遇,既有利于他们思想互动、信任增强、集体智慧叠加等,也面临信息获取碎片化、信息内容部落化、教师权威式微化以及圈层信息同质化等风险。应着重加强其公共领域意识、媒介素养教育,推进主流话语融入等,让新的传媒环境成为大学生科学价值观养成的助推器。

【关键词】大学生 网络圈群栖居 价值观 公共领域意识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1.02.025

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与社交媒体正在不断构筑远超想象的网络聚居社区,让圈群栖居式的网络集体生活成为当下崭新的社会生活状态,尤其是作为互联网原住民的大学生更是如此。当下,网络圈群正在成为大学生摆脱个体孤立状态、融入外在世界的重要途径,营造对外交往、联络情感的重要方式,表达自我、传递诉求的话语空间,这也成为大学生圈群栖居生活模式的形成根基。

网络圈群栖居演化自网络社群生活,是社群成为普遍性网络生活方式的结果。1993年,美国学者霍华德·莱茵戈德(Howard Rheingold)出版著作《虚拟社群》,提出了网络社群的概念:人们凭借网络进行沟通与研讨,达成友人关系的虚拟社会集合体。之后,学界日渐关注这一问题,开展了对网络圈群成因、特征和对策的研究。美国学者罗伯特·D·普特南(Robert D. Putnam)着重分析了网络圈群的成因,认为同质性,包括依据利益或兴趣而结合是网络圈群形成的主因^[1]。聚焦大学生圈群栖居问题,段洪涛等学者着重分析了大学生网络圈群的类型,认为大学生网络圈群按照成因可以分为关系型、兴趣型、地理位置型以及临时事务圈群;按照关系强弱可以分为紧密关系群、自选关系群以及认证关系群等^[2]。叶荔辉从网络圈群中的社交关系逐渐强化、排他性和封闭性较强以及意见领袖同沉默共存等特征重点探讨了高校“网络圈群”的引导困境^[3]。

随着网络发展尤其是社交功能的融入,关于网络圈群栖居问题的研究逐渐升温。但是,既往研究多是对网络圈群特征自身及其通用性影响的研究,鲜有针对网络圈群栖居影响大学生价

收稿日期:2020-11-23

作者简介:阎国华,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

闫晨,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网络道德失范问题及其规制研究”(课题编号:20BKS19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价值观内在逻辑的专门研究。本文旨在对网络圈群栖居现象影响大学生价值观建构的机遇、挑战以及应对进行学理上的探究与讨论。

一、网络圈群栖居成为大学生网络集体生活新业态

栖居一词多指动、植物的栖息寄居,圈群栖居是许多个体以“圈、群”模式聚集并以集体形式生存的社会集合现象。网络圈群栖居是指由社群化网络交往而衍生的网络圈群正在成为大学生人际交往、信息获取以及思想交流等活动的主要阵地,并逐渐消耗他们越来越多可自由支配时间的现象。

随着技术发展,圈和群的能量级和影响力都日益强大。以微信软件为例,腾讯公司发布的微信数据报告统计,微信用户自2011年的5000万增长到2019年的11.51亿。同时,2015—2018年,微信朋友圈日发表视频总量增长480%。《中国青年报》联合问卷网(wenjuan.com)在2020年针对2002名受访者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58.9%的受访者拥有10—30个微信群。方楠在福建某高校采用整群分层抽样方式研究了500名大学生的微信使用情况,发现69.7%的大学生日均收到朋友圈刷新内容100条左右,而有67.8%的大学生每天都会分享信息到朋友圈^[4]。王婷婷在延边大学、吉林财经大学等四所高校随机选取了800名大学生开展网络圈群使用情况调研,发现45.6%的同学网络圈群为5—10个,31.4%的同学网络圈群超过10个。在网络圈群使用时间上,只有12%的同学选择1小时以内,36%的同学选择了1—3小时,38%的同学选择了3—5小时,更有14%的同学选择了更多^[5]。这些数字都表征了圈群栖居现象的深远影响。

网络圈群栖居与大学生价值观息息相关。一方面,网络圈群栖居源于价值观的共鸣。原本缺乏关联的陌生人之所以能超越时空联结在种类繁多的圈群中,主要源自价值观的相似性。不仅如此,网络圈群还被价值观赋予了圈群个性、圈群间界限以及内部黏性,让其更具特色且相对稳定。在特定圈群中,同质者因志同道合日趋亲密,异质者则因彼此价值观差异而被驱逐或自我“流放”。另一方面,网络圈群栖居也深刻影响大学生价值观。它极大地促进了大学生网络生活从“个体”到“群体”的延伸发展,催生他们在社会价值理念、个体道德品格以及心理状态上的嬗变乃至重构。因此,网络圈群栖居催生了新型信息传播模式,改变了大学生的信息获取方式和网络生存状态,让大学生价值观构建面临新的场域,承载着机遇,也面临着挑战。

二、网络圈群栖居现象为大学生价值观构建带来机遇

随着高速移动网络的普惠、智能移动终端的普及以及社交网络架构的成熟,一批诸如QQ、微信、微博等社交软件日益流行。网络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个别到普遍,从单纯沟通联络到网络生存的传播生态变革。基于移动互联网的社交媒体不断发展,用户从最初的新鲜猎奇演变为当下的日常生活习惯,带来的不仅有技术和功能上的进步,还有使用者心态和生活模式的演变。目前,圈群是大学生网络生活的主要业态,也是大学生网络栖居的主要形态。圈群的兴起具有内在的功能性、价值性和合理性,在满足大学生沟通互动、娱乐消遣、信息获取等基本社交需求上,还兼具潜移默化地塑造大学生价值观的重要作用,为大学生价值观构建带来了诸多机遇。

(一) 频繁的圈群互动提升信息获取便捷性

大学生是网络社交功能的重要应用群体,加入或建立圈群已经成为他们网络应用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大学生网络圈群栖居的实现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一是现实关系的网络延伸,即

将现实中本就具有强关系的人用建立圈群的形式聚集在一处,如家庭群、朋友群、社团工作群、班级群等,表达的是强关系的虚拟实现。二是完全依靠网络而生、由陌生人发展而来的群体,其中成员抱有相同目的或共同喜好而建立的社群关系,如交友群、球迷群等。网络圈群一方面拓宽了大学生的信息获取范围,另一方面也提升了信息获取便捷性。这是因为:(1)技术架构扩展信息交换范围。网络圈群提供便捷的社交化交往尤其是同辈群体交往机制,使大学生可以结识更多校园内外的同龄人,打破了传统熟人社交的“圈层”局限,让现实中可能相距遥远、难有交集的个体因某种共同的价值观念而聚合在一起。(2)价值认同促进信息交换频率。价值观的趋同有利于促进网络圈群内部黏性,使得情感升温,让网络圈群内的互动更加频繁。在现实生活中,五花八门的社交主题、全员参与式信息传播以及极高的圈群活跃度等都使得网络圈群正在成为大学生获取信息和塑造价值观念的重要渠道。(3)平等交流鼓励信息实时交换。不同于各大新闻门户软件的严肃播报,网络圈群成员的集聚拓宽了信息渠道的广泛度、适时性和场景感。网络圈群建立之初的陌生感会随着群内的互动而消失,无须固定的发言顺序或一问一答模式,没有尊卑有序的发声规则,让圈群互动氛围更加热烈,日常互动更加频繁,更容易迸发思想碰撞的火花。信息获取便捷性是价值观养成的基础条件,可以显著提升成员的眼界和视野,同时在信息交流中形成积极性价值共识和潜在的交互性监督力量。

(二) 突出的潜舆论色彩带来显著认同优势

“青年同辈群体互动的频率或即时性增加不仅有助于扩大经验和需求,还会改变互动的性质,促进新的机会。”^[6]基于社交化关系带来的累积性内部信任感,网络圈群会显著降低网络媒介的媒体感,同时突出潜舆论功能,使其信息传播具有更加显著的认同优势。网络圈群对网络媒介潜舆论色彩的促进源自多个因素:(1)网络圈群的强关系化为圈群内信息交流注入信任资本。网络圈群往往具有明显的成员强关系化,这一方面是因为部分网络圈群本身来自现实强关系的转换,另一方面是圈群成员逐渐熟悉和信任。信任资本表现为对陌生信息源的抵触性降低、自我防御机制弱化、认同度逐渐提高、戒备心理逐渐减弱以及认同效率显著增加等等。(2)网络圈群的平等结构促进对信息质量的关注。现实群体往往伴随着层级关系的金字塔分布,而网络圈群中的群体则多表现为扁平化结构。在金字塔分布中,教师及传统媒体如电视、报纸占据了传播的主导位置,通过一对多、由上至下式单向传递主导着大学生的信息获取过程。而在圈群栖居的扁平化网络圈群结构中,传播者的身份地位等私人信息往往被藏匿,大学生接收信息时的关注重点更容易聚焦到信息内容和质量上。(3)网络圈群的交互性信息传播隐匿媒体色彩。圈群栖居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上传下达”,实现了圈群成员的多向互通,使得人人都是信息源也都是接收者。这种显著的去中心化特征,促进了传播中心的多元化甚至全员化。基于传播赋权,每个人的传播权力和欲望都到了实现,从而进一步培育圈群交流的潜舆论体验。基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可知,目的内隐有利于受众接受传播者的观点。

因此,潜移默化的渐进式引导往往会产生更好的教育效果,尤其是对大学生群体价值观念的引导与建构。教育者的教育目的越隐蔽,就越能为受教育者所接受,实现教育价值传递。所以,网络圈群带来的媒介潜舆论色彩不仅可以有效促进圈群内信息传播,还可以很好地利用信任资本、平等结构以及交互性传播促进大家对圈群内传播信息的认同。与此同时,网络圈群的潜舆论往往比显舆论媒体更能反映成员的真正价值倾向,反映大学生的实时思想动态和内心世界,这使得网络圈群还成为了解大学生所思所想的关键线索,是开展主流价值观念引领的重要依据。

(三) 集体智慧的叠加促进信息前进性优化

网络圈群的信息传播可以不断汲取参与者的思想和智慧,通过集体智慧的叠加促进信息随

传播总体朝更高质量发展,表现出前进性优化。圈群信息传播对集体智慧的汲取大致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1)信息优胜劣汰机制。经过长期筛选,错误信息逐渐被淘汰,认知度高的信息得以留存。(2)头脑风暴引发思想碰撞。话题经历网络圈群内的深度讨论,极有可能成为一场大型的“头脑风暴”,一次创造力、想象力的集体训练。激烈的讨论常常能引发网络圈群成员的联想,甚或孵化出一系列新思想。(3)限制较少有利于自由思考。由于不受外界过多限制,网络圈群讨论更能激发参与人员的热情,呈现出成员争相发言、相互感染的良好互动态势。(4)良好的话题具有凝聚功能。相较于传统的信息门户平台,网络圈群在环境上更便于对共同关注的问题开展激烈的讨论。网络圈群成员发起的话题虽随性且具有浓厚的个人色彩,但一旦出现社会热点事件的相关话题,讨论则往往更为激烈和深入,最终有助于培养理性价值认知,达到深化主流价值坚守,实现信息质量升华。(5)话语权的潜在竞争激励思考。在网络圈群讨论中,参与者往往都力求通过见解独到、切中要害来争取话语权和认同感,这种无意识形成的竞争机制又会进一步激励成员的思维发散、创新。

三、网络圈群栖居现象挑战大学生价值观塑造

圈群传播融合了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等多种传播形态,兼具隐匿性与公开性、亲密性与陌生性、积极性与消极性、主动性与被动性等多种对立统一关系。基于此,圈群成员也常常因为身份复杂性、网络环境虚拟性和个体身份隐匿性等原因引发一些挑战。

(一) 信息获取碎片化,质量良莠不齐

网络圈群内信息传播往往具有显著的碎片化特征。信息获取的碎片化可以增加信息获取数量,但信息传播和阅读都不再系统化。这会影响大学生的价值观:(1)系统性结论欠缺。在圈群信息获取中,话题更容易断裂和转移,常常因为缺少理论论证和现实说明只能从中获得碎片化结论。(2)深度思考难以形成。信息的碎片化会伴生信息主题的不断跳跃,也会诱使获取者在不同主题间来回跳跃,难以专注于一个话题深度思考。网络阅读使我们回到了“单纯的信息解码”状态,牺牲了实现深度阅读时建立丰富的神经连接的能力^[7]。长时间依赖和浏览碎片化知识会破坏个体深度思考的习惯和能力,引发长期无意识的时间消耗。(3)信息获取焦虑的诱发。大学生不断地在精彩信息丛林中跳跃,反复地浅尝辄止,不但很难形成自己的深度思考,还极易使获取者因难以企及信息的高度而变得焦虑。

此外,网络圈群的传播质量也良莠不齐。由于众声喧哗式的参与方式,网络圈群所传播信息有主流价值的声音,也有消解主流价值产生的成分。造成网络圈群传播信息质量下降的原因主要有:(1)信息海量与多元诱发信息质量分层。网络圈群作为公共领域,实现了信息由人际传播扩大至群体传播,也为不良信息的原子裂变式扩散提供了传播途径^[8]。随着信息体量的扩大,在部分缺乏管理维护的网络圈群中,信息质量难以保证。一些把无知当个性,用低俗来博眼球,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利益至上等的错误价值在网络圈群中泛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信息污染与公共领域的滥用。(2)过度娱乐化引发信息分层。娱乐话题固然新鲜有趣,却难以产生切实的公共价值,更无关社会信仰。大学生用虚拟娱乐虽能短暂逃避现实中的挫折与磨炼,但长久的“娱乐至死”终会消磨掉大学生的高远理想与昂扬斗志。(3)成员心理博弈引发信息质量分层。网络圈群是一个公开发表观点、交流信息的平台,维持秩序主要靠管理员监督与成员自觉。事实上,少数人的发言经常会占据全部的流量通道^[9]。尽管网络圈群的建立打破了时空阻隔,但横亘面前的陌生与拘束感有时也会难以消解。成员数量多与少、亲与疏,都会影响成员的心理放松程度和表达积极性。成员越多,圈群的不确定性就愈强,圈群的私密性降低,使得成

员在话题选择上势必会有所取舍。亲密度高、熟识度高的网络圈群往往互动更频繁,话题也更私密,但口水信息会增多,让信息含金量和价值密度降低。相应地,在一个亲密度相对较差的圈群中,个体对陌生群友的防备意识较强,在话题的选择、观点的表达上则会更谨慎,进而影响高质量信息的诞生。

(二) 信息获取部落化与群体极化风险

从本质上讲,网络圈群是长期价值选择趋同、逐渐形成共性文化认同的直接结果。文化认同在大学生网络圈群形成和存续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既是网络圈群栖居中最显著的表征,也是网络圈群形成和发展的动力。文化认同的显著作用是“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以文化规范自己的行为”^[10]。这种逐渐形成的统一性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使得当代大学生逐渐凸显出“圈层”特点,过度追捧圈群内文化,对圈群外的态度则常常泾渭分明。虽然在话题引发之后,大家在网络圈群中可以自由表达个体意志,但最终会形成意见合意。与此同时,“沉默螺旋效应”会凸显,促进形成群体认同,而“群体认同会产生群体压力”^[11]。群体压力让处于群体中的个体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类似“正义”的力量,从时间绑架到精神绑架,宛如重回部落化时代。由于各自都对自己圈内信息更加认同,不同网络圈群之间的交流开始变得困难,直接导致信息的割据状态,表现出强烈的“部落化”色彩。

处于“部落化”圈群中的大学生以相对封闭的网络小群体进行日常交往,会因为成员的志趣相投而互动频繁,或因文化认同的相似而观点一致,但也会增加发生群体极化现象的概率。所谓群体极化,是指“群体成员中原已存在的倾向性得到加强,使一种观点或态度从原来的群体平均水平加强到具有支配性地位的现象”^[12]。网络圈群栖居条件下,大学生常常因意见不合引发争吵,轻则退群,重则公开羞辱,而沉默的大多数则直接表现出“网络围观”。长此以往,网络圈群很难保持客观理性,引发的“效仿效应”会逐渐演化为网络圈群中的权力滥用。个人在受到群体的影响后,容易做出更极端的决策。对集体而言,网络圈群内部经过激烈讨论后会推举出被大多数认可的观点,支持该观点的倾向在谈论中被进一步强化,持反对意见者会在质疑声中选择与多数同行,抑或保持沉默。个体意识被群体意识所操控,而缺乏监管的群体意识逐渐接近失控甚至到达疯狂的边缘^[13]。这样,网络圈群中的煽动性信息和谣言极易催生非理性情绪和集体宣泄,导致集体失智和极端非理性行为,形成群体极化风险,误导甚至颠覆大学生科学和理性的价值观。

(三) 教师权威式微化,话语权被削弱

凭借信任优势,网络圈群内信息会先入为主地占据大学生思想,引起教师等传统信息源的权威地位被动摇。教师的权威性不断被社交媒体的“无所不知”所消解,话语权随着信息传递优势的削弱而式微。学生信息获取途径的扩展原本无可厚非,但由于圈群内信息传播的泛娱乐化、泛低俗化,极易诱发以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为表征,以娱乐消遣、浅薄空洞为特点的信息泛滥。网络圈群中信息鱼龙混杂,不良信息可以轻易渗入大学生的日常生活,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学生的身心发展。“相对于直接的思想给予,这种情况下的道德教育过程还要增加一个纠正或者祛除错误思想的过程。大学生在不同网络圈群中的生存经历催生出的群体分化,认知程度差异引发的个性化需求,加大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难度。”^[14]

而且,面向大学生的大量负面性文化输入不仅会消解主流文化的影响力,也会消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诱发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年大学生沉溺于感性欲求和空虚思想,将家国天下的情怀束之高阁。如果长期沉溺于社交媒体所营造的“快乐假象”,大学生就有可能过度关注个体层面的欲望满足,摒弃更高层次的理性思考,逐渐失去精神信仰和人生追求。尤其当学生将某些内容视为“自己的文化”和能使自己开心愉悦的事物时,他们可能倾向于抵制或反对教

师所讲的内容^[15]。

(四) 圈群信息同质化与话语权不均衡

传播意图的实现取决于对信息源的态度。在选择信息的过程中,大学生对于信息的选择建立在已有价值观的基础之上。由于网络圈群建立过程中的同质性驱使,大多数大学生在接受新信息时会选择与已有认知相似的信息,并且无意识地从与自我判断接近的观点上拓展认知体系,而较少会去改变已有观点。这种信息建构的路径固化,使得大学生本应具备的独立思考和批评精神在随波逐流中不断衰减,最终表现为思想观念的显著趋同性。不同意见被边缘化的趋势愈加强烈,在缺乏权势和自信的表达者身上更甚,最终导致了“虚拟社群在价值和观点选择上相当同质化”^[16]。“趋同”是“合群”付出的代价,也是群体心理特征形成的基础。在群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和个性被削弱,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吞没,而无意识却往往占了上风^[17]。

“网络交往的平等不代表话语权的平等。”^[18]群体无意识往往表现为圈群价值被少数个体所控制。能够影响网络圈群思想的个体的影响力来源不一,往往表现为不同的赋权途径。他们有的是因为个体的现实影响力、思想深刻性,有的则是源自在圈群内的活跃度。时间会凸显不同成员在存在感、影响力上的差异。长期沉默的成员偶尔发言常常难以得到其他成员的响应,在由陌生人构成的网络圈群中,这种现象尤为突出。活跃的成员能够收获更多回应,并发展成为圈群中的“领头羊”。经过长期的正向激励,意见领袖的观点演变为网络圈群内的主流声音,并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被认同的意见领袖具有“隐形权势”,权势越大,就越能把自己的信息传递给其他人^[19]。这种现象长期存在并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激励机制。成为意见领袖的个体会传播更多信息,圈群其他成员接收的信息量与对意见领袖的认可成正比,继而在网络圈群中的地位获得巩固。久而久之,网络圈群内话语权不均衡的格局逐渐形成,民主气氛也随之逐渐淡化。受其影响,网络圈群成了观念同化的地方,正如有学者提出的“社交媒体不仅没有拓宽我们的交流范围,反而强化了既成的社会等级和封闭的社会群体”^[20]。

四、价值观视域下大学生网络圈群栖居现象的应对

基于以上分析,高校需要高度重视圈群栖居现象对大学生价值观形成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其中的挑战因素,需要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应对。

(一) 唤起大学生的公共领域意识

网络圈群提供了一个众声喧哗、畅所欲言的便捷交流平台,但自由并不意味着没有和不需要秩序。在现实社会中,社会成员往往对于公共空间与公共秩序有着更强烈的意识,在相关行为中更注意遵守来自社会公共价值的规范和约束^[21]。但在网络环境下,虚拟和匿名的生态淡化了个体法制意识与规则意识,以至于部分大学生出现认知和行为割裂现象,使得厌倦现实中的规矩束缚、碍于旁人注视而刻意掩饰的叛逆心理等问题在网络世界全然展露。在这些问题之中,最突出的表现有:(1)“封地”意识凸显。部分大学生经常混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限,例如在社交媒体中萌生出的“封地”意识。他们不再用公共精神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在圈群中诉说现实中不敢说的话,用不当言论和失智行为攻击他人”^[22]。这种现象成为网络圈群出现混乱和不可控的重要原因。(2)规则意识下降。网络环境中存在一些容易造成个体自我意识下降的深度诱因,比如个体常常因为个体藏匿而失去被注视的感觉。自我意识的下降使得一些大学生在网络上表现出知行不一、“他律良好而自律较差”“严于利人但宽以利己”等现象。极个别大学生甚至无视法律规则权威,进行侵犯其他网友权利等违法乱纪的边缘试探。

实际上,个体在网络上的一举一动都是公共传播的一部分,就如同现实世界中在大礼堂内

演讲,不同之处在于发言人的数量由一个变为多个。这就好像个体可能会以为吵闹的大海中没有人留意一条鱼的动向,但互联网更加不会失忆,其全息化的信息检测与储存环境,会将使用者的行为全程记录。在网络上,再微小的问题和过错都可能被无限放大,并引发海啸式的公开热议,包括支持、反对或羞辱。因此,网络圈群的正常运行既依赖于相关的管理,也依赖于个体的自觉行为。大学生在网络生存过程中如果能少一点“封地”意识,多一点规则意识,就会更好地意识到网络圈群的公共领域性质,更好地摆正自己的位置,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将社交媒体缔造成优质信息的交换站、和谐人际的交往场。同时,高校和社会教育工作者也要承担职责,唤起大学生网络交往中的公共领域意识,强化圈群运行的秩序意识,共同维护风清气正的同辈交往平台。

(二) 强化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

由于信息监管和监测难度较大,社交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质量变得难以保障。信息的良莠不齐使得大学生在以法律规范保护的基础上,更应提升自身媒介素养,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媒介现状。媒介素养是个体认知媒介、参与媒介、使用媒介的能力。媒介素养教育是“以社会公众为对象,以培养和提高认知媒介、参与媒介、使用媒介能力为目的的素质教育”^[23]。目前,网络圈群栖居现象的凸显对媒介素养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是从抵御到对抗的素养升级。目前的媒介素养教育多倾向于“保护主义”的动机,希望通过系统的媒介素养教育来防止学生被媒体误导,却容易引发只是被动地抵御错误价值观、意识形态的负面效应,而忽略培养学生在媒介生存过程中的反思能力,收获与错误价值观念对抗的经验^[24]。所以,我们不仅应该训练学生用批判的视角看待社交媒体的信息,还要通过历史思维、辩证思维能力的培养,帮助大学生具备辨别社交媒体传播信息质量的能力,具备在海量信息中找到最有价值信息的能力,具备用客观理性的逻辑方法应对陌生信息的能力。

二是从受传者到参与者的素养升级。当下,个体在媒介面前的角色正由“被动的接收者”演变为“积极的参与者”^[25]。媒介素养教育不仅仅是一种甄别方式或洞察隐蔽意识形态的方法。借鉴英国学者大卫·帕金翰(David Buckingham)构建的概念性框架,媒介素养教育中应该弱化“抵制”与“免疫”意味,而应以学生理解为出发点,向学生提供有助于他们理解媒介的理论框架。在教育过程中,媒介素养教育应该注重对媒介实践能力的培养,以建构教与学的自我反应模式为最终目标,使学生以媒介参与者和受传者的双重身份进行甄选与判定。不仅要帮助他们培育正确认知媒介信息的素养,还要培育他们理性使用与传播信息的素养。

(三) 将主流话语融入大学生网络圈群中

大学生网络圈群栖居背景下,我们不仅要帮助大学生维护好网络圈群环境,提升他们利用圈群获取正确信息的本领,还要主动融入大学生网络圈群,实现对其圈群文化的跟跑、并跑与领跑。

要实现主流话语对大学生网络圈群的融入,需要关注两个方面的内容:(1) 认清大学生网络圈群的建构方法。传统媒体时代,主流媒体具有显著的话语权优势,可以充分保障自身观点形成广泛的关注和认同。但在社交媒体时代,主动订阅成为公众信息获取的选择范式,而个人信息获取习惯是个人长时间主动订阅的结果。(2) 要认清大学生网络圈群的建构动力。主流话语要想赢得关注,只能靠自身努力来赢得大学生的主动订阅,这样的内在动力就是大学生信息圈群的动力。根据笔者开展的一项针对在校大学生的访谈,大学生主动订阅某个信息源的内在动力主要基于喜闻乐见、感同身受、悦纳自我、价值补益以及利益驱动等等。主流媒体要想实现融入,就要紧紧抓住这些动力因素,解放思想,守正创新。实践证明,通过不懈努力,有些主流媒介已经成功地成为大学生喜闻乐见的信息来源,也成为圈群信息的主要来源。诸如,人民

日报、共青团中央以及央视新闻等主流媒体已经成为深受大学生喜欢的官方媒体,被大学生频繁转发或分享,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们符合大学生信息获取的价值需要与审美需求。

总之,网络圈群栖居现象改变了大学生价值观养成的底层生态,带来了机遇,也面临着挑战。网络圈群栖居有利于帮助大学生形成便利的社交环境,为大学生提供一呼百应、交融碰撞的同辈群体思想交流机制。频繁的圈群互动带来信息获取便捷性,突出的潜舆论色彩带来显著认同优势,集体智慧的叠加促进信息前进性优化等,网络圈群栖居为大学生价值观养成构建了有利的信息环境和认知环境。但与之相伴而生的个体身份复杂性、网络环境虚拟性和个体身份隐匿性,也常常引发信息获取碎片化与质量良莠不齐、信息获取部落化与群体极化风险、教师权威式微化与话语权被削弱以及圈群信息同质化与话语权不均衡等相关问题,对大学生价值观养成形成挑战。甚至,网络圈群栖居中的个体藏匿、“新部落化”、群体极化和同质化等风险还会进一步加剧大学生的价值认同危机。解铃还须系铃人。增加大学生的主流价值认同,关键在于激发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唤起大学生的公共领域意识,强化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将主流话语融入大学生圈群,从大学生自身能动性和外部因素引导两个维度来消解不良信息和错误观念带来的负面影响,让新的信息传媒环境成为大学生科学价值观养成的助推器,而不是绊脚石。

【参考文献】

- [1] Putnam, Robert D.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Paperback Edition. Simon & Schuster, 2001. p. 178.
- [2] 段洪涛 赵欣《高校网络圈群的特征及其舆情治理研究》,载《思想理论教育》2015年第3期。
- [3] 叶荔辉《高校“网络圈群”舆论引导的困境及路径》,载《思想教育研究》2018年第1期。
- [4] 方楠《差序格局中的自我呈现:大学生微信朋友圈分享行为动因解析》,载《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 [5] 王婷婷《网络圈群背景下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研究》,哈尔滨理工大学2020年硕士学位论文。
- [6] Nesi J, Choukas - Bradley S, Prinstein M J. Transformation of Adolescent Peer Relations in the Social Media Context: Part 1 -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Application to Dyadic Peer Relationships. *Clinical Child and Family Psychology Review* 2018 (3).
- [7] 尼古拉斯·卡尔《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刘纯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33页。
- [8] 兰甲云 曾思怡《微信公共领域里的失范行为及其法治规范建设》,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 [9] 宫贺《网络信任对信息传递与意见寻求的影响——基于微信用户与微信群的实证研究》,载《新闻与传播评论》2018年第3期。
- [10] 崔新建《文化认同及其根源》,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 [11] 郑满宁《共振与极化:社交网络的动员机制》,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163页。
- [12] 王爱玲《中国网络媒介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7页。
- [13] [22] 阎国华《提升自我意识,加强网络道德建设》,载《学习与实践》2017年第9期。
- [14] 阎国华《论微文化时代的传播生态与高校道德教育调适》,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 [15] [24] 大卫·帕金翰 宋小卫《英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超越保护主义》,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2期。
- [16] Dahlberg L, Siaper E. *Radical Democracy and the Internet: Interrog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07. p. 79.
- [17]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 [18] 胡婉婷《“信息茧房”对网络公共领域建构的破坏》,载《青年记者》2016年第15期。
- [19] [20] 詹姆斯·柯兰 娜塔莉·芬顿《互联网的误读》,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3、145页。
- [21] 袁航《公共理性:理性个体与公共规范的统一》,载《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 [23] 袁军《媒介素养教育论》,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8页。
- [25] 梁庆婷 包娜《全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困境反思》,载《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责任编辑:王俊华)